

选优配强乡村振兴“领头雁”

陈安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乡村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明确要求“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今年以来，各地陆续迎来新一轮村级组织换届，全心全力选准选好班子是换届的首要任务。立足夯实党的执政之基，为农业农村现代化锻造一支政治坚定、本领过硬、群众信赖的基层铁军，为打造新时代“千万工程”的典范样板提供组织保障，具有重大意义。

沉下心调研，找准矛盾点

村级组织换届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深入调研找准病灶、摸清家底，确保换届工作靶向精准、有的放矢。

走访上力求用心用情。坚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叩开民心，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全面摸清换届相关基本情况，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抓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班子队伍建设等换届工作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潜在风险，做到脚上多留点泥巴、耳上多留点百姓话语、心上多留点群众诉求。

内容上力求全面客观。结合换届所需，推动民政、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数据互联互通，全面摸清行政村内村庄情况，详细掌握人员信息，梳理形成村情画像“一张图”，做到数据一网打尽、情况一目了然。

作风上力求实事求是。沉下心来切实改进换届调研的作风，真正做到不搞形式主义、不走过场，真正掌握影响班子运转和发展稳定的主要问题。要压实乡镇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

的工作责任，敢于走进班子软弱、经济困难、问题突出的行政村，直面主要矛盾、解剖根本原因，在全面了解行政村情况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筑同心聚焦，选好领头雁

坚持把选优配强领头雁作为重中之重，坚决把牢人选入口关、能力关、群众关，全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本领过硬、群众信赖的头雁队伍，推动实现“选好一个人、造福一个村”。

统筹谋划“搭架子”。要强化顶层设计，综合考虑村班子成员配备、结构优化，提出年龄、学历、资历、能力等标准要求。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切忌搞“一刀切”。要抓住村党组织书记是否调整这个重点，对按照制度规定或工作需要退出或转任的，要多听党员意见、多评业绩表现、多看群众口碑，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作出决策。

严把标准“定调子”。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头雁人选标准，将“两个维护”贯穿人选研判全过程，做到首关不过、余关莫论。坚持广开贤路、不拘一格，持续深化后备力量培育储备，重点从农创客、退役军人、新就业群体中物色储备主职后备人选，不断壮大头雁人选“蓄水池”。要坚持组织意图和群众意愿相统一，多听取老书记想法，做到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并通过规范程序形成人选方案。

立体赋能“压担子”。村级组织换届后开局很重要，对新班子尤其是新书记，要坚持“扶上马、送一程”，乡镇党委要结合实际，帮助厘清发展思路、完善五年规划、谋划实事项目、完善规章制度。要强化帮带指导，开展乡镇书记、联村领导结对帮扶，适时召开镇村联席会议加强村级重大事项指导，整合资源强化土地、资金、

人才等政策倾斜。

聚人心攻坚，理清新思路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因地制宜找准村庄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工作重点，聚人心、破难题，推动从“一村强”到“村村强”的跨越。

坚持盘活产业，确保组织有钱办事。集体经济强了，组织说话才有分量、办事才有底气。要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深化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土地流转、物业经营、产业联营等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用好强村公司、党建引领“共富工坊”等带富载体，“一村一品”打造乡村旅游、红色研学等特色产业，确保村村有项目、年年有分红。

坚持平安建设，确保组织有法处事。把准村民委员会属于自治组织这个重要定位，坚持以“四治融合”推动乡村善治，持续强化法律规范普及教育，建立健全各类议事协商平台，推动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探索开发数字化平台，对电信诈骗、征地纠纷等乡村高发问题挂牌整治，让平安善治可知可感。

坚持制度规范，确保组织有章理事。坚持制度管人、流程管事，建立健全村规民约，严格执行“五议两公开”、“三务”公开等规章制度，全面规范议事决策、三资管理、工程招投标等工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事务在规矩中推进。

坚持抓人促事，确保组织有人管事。注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聚焦产业发展、矛盾调解等认领责任区、责任岗，形成书记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的良好氛围。深化“村企结对”“校地合作”等模式，以党建为纽带争取资源下沉，画好助力

乡村振兴最大“同心圆”。

葆初心励志，担当勇作为

村级组织换届是基层组织建设的大事要事，要坚持压实一条链、凝聚万钧力，将选优配强农村带头人的重大责任传导到人、落实到位。

压实责任抓统筹。党委是村级组织换届的责任主体，要坚持“书记抓、抓书记”，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联动领导体系，将换届成效纳入党政领导班子政治建设考察和党建述职评议核心指标，明确由组织部门抓业务指导、纪检监察机关抓纪律监督，对责任落实不力、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地区实施“黄牌预警”，以责任倒逼推动工作落地，确保“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

分类指导强施策。重视改进工作方法，坚持因材施教、分类指导开展工作，针对不同类型行政村差异化制定换届方案。对集体经济薄弱村，重点选派懂经营、善管理的干部，配套产业扶持政策；对矛盾突出村，坚持直面问题、动真碰硬，选配群众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开展信访积案攻坚；对基础较好村，推动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转型，以分类施策破解“一刀切”困局。

分工协作聚合力。坚持系统性、整体性的原则，发挥党委统筹协调作用，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打破部门“数据孤岛”和“职能壁垒”，推动组织部门主导的“人才选育链”、纪检监察机关主导的“风险防控链”、农业农村部门主导的“产业振兴链”深度融合。要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群众参与”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民主延伸，激活基层“自我组织、自我调节、自我服务”的内生动力。

(作者系宁波市党建研究会会长)

漫画角



数字时代的“泛娱乐化”现象亟待破除

王立衡

娱乐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历来受到广泛关注。近2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市场经历了从起步到繁荣的巨大转变，成为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伴随着“泛娱乐化”引发的对文化深度和价值导向的反思。

泛娱乐化作为数字时代突出的社会现象，反复强化娱乐的优先性。这使人们容易被娱乐化的表象所迷惑，产生情绪共鸣，过度沉迷于娱乐景观的虚幻性，最终导致审美能力、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的缺失。数字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泛娱乐化的主要活跃区。泛娱乐化呈现怎样的模样，又该如何识别？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时间更容易被新奇的感官体验消磨掉。不少文化内容的创作者为了迎合受众，不惜编撰一些低俗、夸张，甚至虚假的泛娱乐化内容，通过恶搞等戏谑行为，以追求受众黏性。当人们被一些看似有趣、好玩但实际掺杂商业利益的内容所吸引，频繁地关注娱乐内容或热点事件，进而盲目跟风、冲动消费，长此以往，会逐渐失去对有价值、有意义事物的关注和追求，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娱乐消费。很多人就这样不经意间从看客变成了“泛娱乐化怪圈”中的流量和韭菜，最终沦为助推泛娱乐化的一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泛娱乐化的蔓延，深刻影响到现实中的人和社会，引发人们对娱乐边界的再度思考。

泛娱乐化的核心表现在于将娱乐价值作为作品优劣的唯一判断标准。在流量裹挟下，严肃的公共议题、新闻报道掺杂大量娱乐因素，干扰信息传播，误导公众认知和判断。资本趋利性是泛娱乐化的重要推动力，真人秀节目的“唯流量论”是泛娱乐化现象的典型例子。“明星+流量+饭圈”，短时间内就能放大成舆论热点事件。如2021年赵丽颖与王一博粉丝的“互撕”事件，被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列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重点案例。“唯流量论”盛行，必将影响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主流价值、主流文化、主流舆论产生消解作用。

泛娱乐化使得基本价值观模糊化。在全民娱乐化的氛围下，一些原本明确的道德底线可能会变得模糊。比如，一些短视频内容过度宣扬“一夜成名”“快速致富”等扭曲的价值观，“暴走漫画”恶搞烈士事件、玩梗“杜甫很忙”等，恶搞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的视频以创意的名义被大量传播，从而模糊了对尊重历史、尊重英雄这一基本道德观念的认知，消解了严肃和崇高的价值。

泛娱乐化削弱文化内涵的传承。近期，不少AI篡改经典作品的短视频

频，引发广泛争议。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打起了拳击，《西游记》中的唐僧“答应”了妖精。一些低俗、夸张的作品，将传统文化简化为符号化的娱乐内容，导致文化内涵被淡化甚至失真，失去其原有的文化底蕴。在这样的环境下，观众没有耐心去欣赏具有深刻内涵的艺术作品，模糊了审美判断标准。

泛娱乐化造成精神世界的荒漠化。在泛娱乐化的环境中，人们逐渐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郑永年教授就曾呼吁，要有面向未来的有力思想。整日沉迷于轻松、诙谐的泛娱乐化文化产品，如短视频、网络游戏等，依赖通过感官刺激来获取满足感，只会造成精神世界的荒漠化。

应对泛娱乐化的消极影响，要从泛娱乐产生的心理需求出发，多方参与，引导人们走出误区。

从文化管理者层面看，国家为整治泛娱乐化问题提供了政策和法规支持。相关部门出台文件，明确要求抵制不良倾向，规范文化娱乐市场秩序。2021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同年，中央宣传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坚决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低俗“网红”、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化倾向，针对流量至上、“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文娱领域突出问题部署治理工作。文化监管

者采取的“限制”“封杀”等举措，虽直接有效，但要根治泛娱乐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还需从源头着手，开展深入治理。

从文化生产者层面看，应对泛娱乐化需要正向的培育和引导。主流文化应积极引导娱乐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构建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如浙江将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列入政府民生实事，通过“浙里文化圈”数字化平台，为群众提供精准文化服务，形成一个个“文化聚落”。主流文化引领要用贴近当代人认知特点的传播方式，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越剧《新龙门客栈》得到年轻人热捧就是最好例证。

数字时代，重构积极健康的文化生态，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泛娱乐化利用了人性最基础的生理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公众主体意识严重缺失的问题。传播媒体、文化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感，严格删选、优先推送正向价值的娱乐内容。数字时代的年轻人，更需要自我反思中寻找自我价值，通过参与深度阅读、艺术欣赏、户外运动、生命教育等重建健康的心理和丰富的精神空间，纠正泛娱乐化的社会心态，在多元文化实践中收获自我成长。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20GXSZ04YB），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阳明学院]

朱时宏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科技革命重塑产业形态的时代背景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根基，正经历着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化、智能化转型的深刻变革。这一转型进程中，“新农人”作为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承载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使命。习近平总书记

政府统筹与经费投入，夯实“新农人”培育的要素支撑

在全市梯次布局1个市级农民学院、10所县级农民学校、N个农民田间课堂的“1+10+N”现代乡村人才培育体系，明确了“科技入农、资本下乡、人才回流”三大核心举措。这一政策体系不仅为“新农人”培育提供了有力支撑，还促进了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发力。

宁波加大各级财政对“新农人”培育的支持力度，设立市级乡村振兴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并建立逐年稳定增长机制。明确资金用途，重点支持“新农人”教育培训、创业扶持、技术研发与应用等方面。拓展多元化资金筹集渠道，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通过捐赠、设立奖学金、参与项目合作等方式参与“新农人”培育。

产业“学院”与数字赋能，拓展“新农人”培育的学习场域

宁波注重实体化教学平台的建设，到目前为止，建立农民培训基地77家，其中37家被评为省级农民田间学校，3家为全国县级优质农民田间学校。

如象山柑橘学院与省内外高等院校合作，打造柑橘“新农人”培养高地，涌现出一大批技术和致富能手，“象山‘红美人’师傅”跻身首批“浙农智富”。宁海县依托农民学校、实训基地、田间课堂，个性化制定“阿蛭嫂”培养计划，将一群卖蛭嫂打造成新农人“阿蛭嫂”，成功入选第二批“浙农智富”。

此外，宁波还借鉴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经验，打造了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产业链培训平台。

在数字化赋能方面，自主开发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港平台，整合了全市35所中高职院校、125所成人学校等优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资源，建立164个培训点，培训农村实用人才17.2万余人次，产生经济效益19.11亿元。

同时，积极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如2024年成立的宁波现代农学院，与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提升“新农人”的国际视野和专业知识储备。

产训融合与订单培养，提升“新农人”培育的质量实效

宁波构建了“核心课程+特色模块+实践教学”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既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又凸显地方产业特色。例如，宁海县推出的“宁海五匠”培育计划，采用“理论学习+实地实训+创业指导”的三层递进培养模式，有效提高了学员的创业成功率。

在课程内容上，借鉴欧美国家的农业职业教育经验，引入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智慧农业技术等前沿课程。同时，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确保课程内容与市场需求的高度契合。此外，注重实战化教学，依托联盟资源成立32个农民培训项目开发小组，为“新农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

全面推行“导师帮带制”，构建由多名高校专家教授、乡土技术能手组成的多元化导师队伍。建立导师与“新农人”的精准帮扶机制，通过一对一、一对多等方式，为“新农人”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指导和服务，提升了“新农人”的实战能力。

机制优化与跟踪帮扶，促进“新农人”训后的创业致富

建立“新农人”训后可持续发展配套性政策完善机制，有效破解参训农户在信用贷款、职称发展、产品销售、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在信贷方面，推出“兴农贷”“兴农贷”等产品，根据“新农人”的经营项目、资产状况、信用等级等因素，合理提高授信额度，简化贷款审批流程，降低融资成本。

在职称发展上，推进“新农人”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制度改革，修订完善职称评价标准，打破学历、资历等传统限制，突出农业生产经营业绩、技术创新成果、带动农民增收等评价指标。

在生产经营上，加快市级智慧农业大数据中心建设，整合农业生产、流通、市场等各类数据资源，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新农人”提供精准的市场信息、技术指导和决策支持。推广“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平台服务体系。加强与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的合作，构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网络。

在风险防范上，完善土地流转风险防范制度，推广“土地流转+风险担保”模式，建立土地流转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处置机制。引入第三方担保机构和农业保险机制，为土地流转双方提供风险保障。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持续深化“新农人”培育工作，创新培育模式与路径，对于保障农业产业稳定发展、提升农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面向未来，宁波必将持续深化理论探索，优化制度设计，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努力走具有中国特色、宁波辨识度的乡村振兴新道路，为全国乡村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模式。

(作者单位：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农人」精准培育的宁波实践